



十大笑星

趣闻

杨再立 著
王 均



十大笑星趣闻

杨再立 王 均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贺铭华 鲁 颖

封面设计：李 欣

十大笑星趣闻

Shida Xiaoxing Quwen

杨再立 王 均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绥化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616/18 字数 100,000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198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819

统一书号：10093·777

定价：1.35 元

目 录

.....	侯宝林
苦恼人的笑	
——马季自述.....	1
先是为了饭碗.....	2
风车儿哟风车儿.....	9
难得糊涂.....	15
就算是“挖人有术”.....	20
自个儿家断了香火啦.....	22
姜昆这“大小子”.....	25
殿堂门外，拣西瓜籽儿.....	26
高个儿演员身上有“磁场”.....	28
十年出不来一个艺人.....	30
出身从爷爷算起带来的苦恼.....	31
拉起了红卫兵话剧团.....	33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5
招灾惹祸的“黄色歌曲”.....	36
必须把爱转到锅台上去.....	37
犯了“经济问题”.....	39

忘不了那位姑娘·····	40
和林彪同时“犯事儿”·····	42
头一回看李文华演相声·····	45
这到底是什么艺术！·····	47
深夜来了个警察·····	49
领到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证·····	52
和李文华说《如此照相》·····	54
电影没拍成·····	57
一张报纸，一部电视剧·····	58
剧场外边·····	60
他本来可以当个好丈夫、好爸爸·····	62
“姜老昆”挺好听·····	63
治团方略·····	65
小子长大了·····	67
慈祥老妈倔老爹	
——“捧哏天才”李文华记事·····	68
艰难时世·····	70
练兵千日·····	76
难为配角·····	81
大吉在后·····	85
功夫在“相声”外	
——侯耀文印象·····	87
多亏了大碗儿茶·····	90
苹果杏儿桃儿柿儿栗子李子梨·····	92
出身名门的苦恼·····	98

他也爱好爬山	102
笔端酝风	106
好事多磨	
——“英俊小生”赵炎	108
无心栽树也成荫	108
棒打鸳鸯终不散	116
每日一笑出奇想	125
师胜杰的故事	128
七岁上台说相声	129
十九岁的驼背翁	134
讲笑话不惧地头长	139
哈尔滨，我回来了！	143
艰难的恋爱	146
结了婚还恋爱	152
有点怕师傅	156
名人的苦恼	159
常宝华这五十年	164
“蘑菇”世家	164
笑里有眼泪	166
“为国捐躯”，值得！	168
当了战士	170
与水兵搭档	171
周总理为他改相声	173
笑，成了遥远的往事	176
结识了一位小姑娘	180

多亏了那么多“帽子”	182
给后代留下点什么	184
相声舞台上的“大岛茂”	
——郝爱民记事	186
“大岛茂”是李秀明发现的	186
他担心当不上爸爸	193
小品没有做完	199
一号人物原来是她	204
高英培轶事	207
光头和光头不一样	207
师弟低着头叫师哥	209
二十四岁上还罚跪	210
夫人原是苦出身	213
乔凤楼又是“二个他妈”	214
说相声的改蹬三轮	216
高英培失踪了	217
四合院升起的“土星”	
——记石富宽	219
四合院里的梦	220
胆小有胆小的好处	224
实在人有个好运气	230
最重要的还是勤奋	234
用日语说相声	237

苦恼人的笑

——马季自述

请进。

马季。

这屋坐。把鞋脱了怎么样？光脚丫更舒服。哟，我不只光脚丫，还光肚皮呢！等我穿上老头衫儿。啊？静电？我这地毯是纯毛的，绝对没有静电——没事儿，一样，穿着鞋子也一样。

对，猜着了，这是我夫人，于波，中国唱片社音乐编辑。我们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我进厨房上灶当大师傅，夫人负责全部家庭内务，我儿子马冬——他今年十八岁，高三——专管外勤，购物买菜之类。当然，我每年有八、九个月在外面。我不在时，我的职务由他们母子轮流代理。

今年夏天我一直在海边转悠。刚从大连回来，过两天去青岛，然后去威海。

在大连已不少日子了。我和赵炎、王金宝一块儿正在搞点试验。大家都一劲儿说相声要改革，相声要提高，相声要发展。但怎么搞，搞什么？从前年的《宇宙牌香烟》开始，我就想结合电视搞电视相声

小品。为此我前年就打了报告。有不少阻力，但我们要坚持干下去。我们先是与河南合作，我去了之后又叫上了赵炎，王金宝一同去。赵炎去河南时，上级某负责人威胁：“你要考虑，是听党的，还是听某一个人的！”但赵炎还是去了。可惜与河南合作的十几个小品不大理想。于是去了大连，到今年十月份，二十一个电视小品将陆续与观众见面。搞改革不容易，各行都如此。我反正是豁出去了，不就两个票儿——党票和工作证吗？我攥在手里。王金宝更冲：“不管怎么样我也干下去。最不得了，是我退职，在门口摆地摊儿卖白薯就是了。”

噢，我象是作演讲了吧？怎么，还给我列了个提纲？出身经历？艺术道路？创作与思考？生活与爱好？噢，怎么还有“挖人有术”一条？好吧，既然这样，我索性就从头儿说起吧。

先是为了饭碗

我一九三四年生在天津宝坻县的黄庄。宝坻是有名的穷地方，黄庄更穷。这是片洼子地。十年九旱，一年不早收蛤蟆！因为穷，黄庄出一行匠人——剃头匠。在叮咣穷的黄庄，我们家就算“小康”了。我父亲是干跑买卖这一行的。他受雇天津粮栈，跑北京与天津之间。我大约摸知道他好象经常去乡下，专看收购的粮食成色如何。

三岁时我到了北京，在北京长大，上学。

初小在西黄城根小学就读。去年这个小学校庆，还专门派了人来请过我呢。高小入西城扶轮小学校。这所小学当时是日本人办的，只要高小毕业就可以分配工作。我父亲送我上这个学校就是为了饭碗，扶轮小学的校长和教师都是日本人，学生读的是日本课文，每天要做日本体操。在这读书几年，就一个感觉：日本人欺侮中国人实在太甚。甚至经常有抽血的事——为了给日本伤兵。寒暑假还干过不少活儿，擦火车头，到通县捡白薯块。学校动不动就有体罚，经常是教师把两排学生排好，然后抓住两个学生的头，往中间对撞，一对接一对撞下去。我们班主任是位女的，姓前川，我们背地里叫她“钱串子”。有一次，当钱串子撞到我前面的学生时，我突然抽身跑出队列。“钱串子”马上追我。我绕着学校的一圈丁香跑，到底没让她抓着。可是有更厉害的惩罚等着我。“钱串子”去校长那儿告了状，于是我被罚跪，跪在大太阳底下，举着抽屉两个小时！

我真恨得肠子生疼，不想干了，但家里逼着上。盼着高小毕业，能分配到铁路上端个“铁饭碗”。哪怕当司炉呢，总是有个行当啊。

高小毕业那年正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的“铁饭碗”的梦也破灭了。我考上了中学——志诚中学。这是所私立中学，在西单口袋胡同。私立中学要求不严，读了一年感觉还不错，就是走得太

远。当时我家住西直门，每天来回走，带两个窝头做午饭。第二年又进了白塔寺的平民中学（现四十二中）。在平民中学只上了一个学期。父亲突然去世，死于天津。母亲去天津办了丧事回来，我们也失了学。她是家庭妇女，我们没有了经济来源。我们兄妹三人，哥哥被送去天津谋事，妹妹被送到香河县师范学校读书，那儿是公费。我被送到了上海，进了上海宏德工厂。号称工厂，其实就是个小作坊，统共二三十人。作坊的老板是北方人，一个精明的小业主。他把北方的绣品拿到上海制成枕头、枕套、被单、台布出售。北方人就招北方人做学徒。学徒其实是伺候人，并且谁都得伺候，什么都得伺候。早晨，伺候洗脸水，把师傅叫醒，再给卷了铺盖，然后伺候他们吃饭；工人干活就伺候一旁，专等有事，跑腿学舌打下手，晚上，还得伺候马桶……后来一位掌柜得了肺结核，我每天伺候他吃菠菜，把个掌柜“伺候”死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军围住了上海城。上海解放战役打响了。记得是一个晚上，我睡在工厂的一个货柜中间的挡板上。突然大炮轰鸣，整个上海好象都被震得快翻了个儿，我一下子被震得滚到了地上。奇怪的是，我倒并没有害怕，我跑到大门口看巷战。门口就是国民党部队的沙袋街头堡垒。又一个晚上，我看到了门前露宿的解放军。这条街叫河南路。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差不多同时，我有一表姐入了华东军政大学读书。她偷偷儿地给我来了一封信，大意是告诉我，军政大学马上又要招生，只要高小毕业就可报名。她希望我报考。报考时要准备两张照片。这可把我难住了。我们学徒是不给钱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看到大街上有不少小伙子穿着回力球鞋直眼馋，没法儿我就想了个损招儿，跑厨房里用炉铲子把我穿的鞋底铲去半截儿，然后跑到老板那儿要钱买鞋。无论如何，报考军政大学是太诱惑人了，我得想法儿照张像。天无绝人之路，刚巧这时有一位阔人家的小姐结婚。当时的风俗，阔户人家的小姐是极讲究陪嫁的。陪嫁自然少不了床上用品：枕套、枕头、被单、褥单……这位小姐在我们厂订了货。到送货那天，正好轮上了我。那会儿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登上三轮儿，把整整一车的枕头套儿之类送到那位小姐家。我变着法儿，多要了好几块钱。登车时把大门口挨训、差点儿叫狗咬着的窝囊事儿全忘了。

有了几块钱，我就跑到照像馆，照了像。照过像，心里还美滋滋地急等着看自己的“尊容”呢。不想，掌柜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掌柜把我找了去，问：“你从哪儿弄的钱？”我自然是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好啊，你小子也干得出这事儿，我还真没看出来！行了，你别给我干了，回你妈那儿去吧！”原来掌柜是认识我妈的。我心里说，好，我还不想干了呢！走

就走。第二天打车票，然后三天三夜，就回到北京了！

回到家我才知道，敢情我还挣了一百多块钱呢！柜上不发给学徒，都寄家来了。只可惜走得早了点儿，要不然，分浮财还能分到一台缝纫机呢！

回到北京，又在培德中学（现在北京三中）读初三。这是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开始。“唇亡齿寒”、“保家卫国”。学校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

在上海的时候，每晚我们三个学徒住在厂里。没事儿干，就听广播。听的最多的是故事、相声之类，梅熹、张伐、石挥、刘宝瑞等，经常有“慰劳国军”的节目。常听相声，慢慢上了瘾，自然也就学会了不少段子。这会儿上街宣传，可就派上了用场。我参加宣传队时，选了老舍的一段相声，叫《新皇历》，是用一些书名、诗名、歌名、曲名、戏名串起来的，“领着《王贵和李香香》奔了《赤夜河》……”只用了一天，就和搭档背了下来。

街头宣传，气氛热烈。当时正是最好热闹儿的岁数，心一下子就收不住了。我就想报名当兵，想去考军事干部学校。人家一看还没有毕业，不要。于是每天翻报纸看招人广告。偶而看到新华书店招收店员，要求是“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我赶紧跑去掏三分钱挂了个电话问：“初三行不行？”答：“可以报考试试。”我就报了名。考试那天，我把试卷一打开，乐了。怎么回事？原来考试试题几乎全是照着

当时初三教科书的习题出的。我刚念完初三，这些题都是刚做过不久，烂熟的。我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就做完，早早交了试卷，回家听相声去了。没过几天，我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于是我成了北京新华书店总店的一名职工，那是一九五一年三月五日。

到了书店，我估摸也许能干上售书部售书之类的差事。不曾想，一上班就让我去王府井书店门市部拎着水桶擦桌角的泥。干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让我去搬书。每天书架上卖出的，要从书库里提出补上。这活儿全凭手工，两手抬起一块板子的两头，中间叠满了书！每天全部搬书的活，就由两个人全包了。我想这该是试用，所以拼命干。当时我非常羡慕在出纳台收款开票的。我一心琢磨着能干上开票的活儿。平时我没事儿就蹭在开票的人旁边。在上海学徒时我学会了拨算盘。每到星期天，我不休息，跑到店里来，帮忙开票儿。结果，就这么卖劲儿“表现”，到底也没干上卖票那活儿。从一九五一年一直到一九五四年，我就每天从库房到门市部之间来回跑，多少册书，就是经过了我的手摆到架上，再卖到读者手中。

经过三年多的“考验”，我升到了计划发行科。到计划发行科的工作是跑推销征订介绍。一种是拿到新书预告后，即向购户征求预定；再就是新书一出，便蹬上自行车——当然是公家的车——去向用户介绍。我当时跑部队，主要线路是门头沟、长辛

店一带。从王府井，骑自行车往门头沟、长辛店“干”，您想想怎么个累法儿？骑着骑着就累得受不了啦，把车子往沟里一扔，往草丛里一钻，眯上一小觉儿，这是常事儿。部队的干部战士挺知道我的辛苦，表扬信不断地往发行科、总店寄。苦算没白吃，我被选为五四年新华书店系统先进工作者。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我第一次得到奖金五十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然后参加北京市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坐上了主席台。公司头儿还曾跟我说，已把我报上了北京市劳模，后来不知怎地，没了下文。

一九五五年，我被分到西城西单分店。又没多久，让我自己一人，在总后勤部大院里一手筹办了一家小书店。然后又分来了五个人。接着又分来一个从山东调来的科长，任命为总后门市部主任。这段时间我一直没放弃我说相声的业余爱好，只要有联欢会什么的，肯定落不下我，每场必到，参加演出。这位山东“科长”主任来了之后就不让我去，这就有了矛盾。我申请调出，于是被调到高级党校。又是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个门市部，有三个人。在党校时，活动更多，我渐渐地竟说出了点儿小小的名气。看来我还挺能干，海淀成立门市部，又调了我。这次给了我一个官儿：十四个人的门市部，我任第三副主任。

转折点悄然来到。一九五六年，全国曲艺会演，我参加了，一下露了脸儿。煤矿文工团、中央广播

艺术团都要调我去。他们找新华书店工会。工会对我说，“不要出去干演员，调你到工会来管文体工作怎么样。？”不想煤矿文工团那边已经将关系调走。我突然被通知去煤矿文工团报到。发给我一个大化妆盒，打好了车票。搭上车赶紧去北戴河追文工团。从干这行儿开始，我就是这么紧张、匆忙的！新华书店对我还真够尽心的，留了我半个月，解决了组织问题。我是作为中共党员进了煤矿文工团的。不久又转到中央广播局，进了中央广播说唱团。

去中央广播说唱团那天是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刚刚二十二岁。在这个金子般的年华里，我开始了三十年的相声演员的苦恼的历程。

风车儿哟风车儿

我的相声启蒙，与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不少中年以上的相声演员一样，是始于启明茶社的。

小学三、四年级时，我的一位同学叫吴长昆，与常家是亲戚。当时常家可以说是相声第一世家，一家三代，十几人说相声。启明茶社场子以常家为主。相声场子每晚都开，我这位同学每晚下课之后就去启明茶社帮着收门票。他去时便带着我，可以免收我的票，白听相声。刚才说学徒时上了瘾，其实瘾是从这会儿就上了。

第二阶段，便是上海学徒时，每晚听收音机中

的相声节目。

第三阶段是上街宣传，小拭牛刀，发现说相声还挺合适。

然后是书店工作，算第四阶段。在书店工作时，我有两大爱好：篮球、足球、相声。

那个时候，鲜鱼口儿有迎秋茶社相声大会，我是每周六、周日，一定去听。星期天是从早到晚有场子。我听完日场，弄点饭吃，接着听晚场。

在启明茶社，我爱上了相声；在迎秋茶社，我开始认识了相声。从前只知道听了好笑，相声就是逗人乐。迎秋茶社时，高得明《不离婚》、赵春田《公费医疗》等都是新相声，已经突破了传统段子的范围，直接反映现实生活，这些给我印象极深。

一直到我在会演时爆了冷门为止，我还从来没直接接触过专业演员。侯宝林的演出，也仅在五四年看过一次。那是在长安大戏院，我排了半天队买票看了一场。唯一一次“试接触”还是写信。听了赵春田的相声之后，我觉得好极了。写了一封信向他要《不离婚》的本子，结果他压根儿没理我。

在书店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期刊杂志。每到新杂志，我就赶紧找出登载相声的几种，翻看有没有新相声。只要有，我必看，并且差不多背下来。《买猴》等好几个段子，我就是在杂志上学会的。

一九五六年全国职工曲艺调演，我说的相声是